

悼馮以涇 憶明原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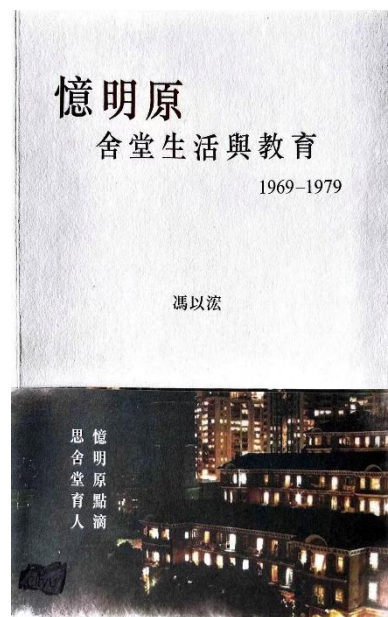
馮以涇先生於 7 月 3 日安然離世。馮先生的名字，常常與香港大學的明原堂連在一起。明原堂是港大的學生宿舍，“生存”於 1969 年到 1992 年。卻是香港大學不可忘卻的一段歷史。



■ 馮以涇先生

馮先生曾著有《憶明原：舍堂生活或與教育 1969-1979》，裏面有詳細的敘述，當時正是香港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，可以說是香港高等教育的重要歷史記載；也可以從側面看到香港社會的轉折點。筆者在 1987-92，曾任明原堂舍監，雖然火紅年代早已結束，也是一段難忘的經歷；也是在港大校園居住 28 年的起點。這裏撮要簡述關於明原堂的始末（大致根據馮先生書中的親身記錄與學生訪問），加上一點筆者的觀察。

明原堂的前身，是四所古老的學生宿舍。盧迦堂（Lugard Hall，建於 1913 年）、儀禮堂（Eliot Hall，建於 1914 年）、梅舍（May Hall，建於 1915 年；還有隔一條馬路的馬禮遜堂（Morrison Hall，建於 1913 年，1916 年正名）。當時每一所都是獨立的，每一所宿生 70 多人，有自己的飯堂，不過都是男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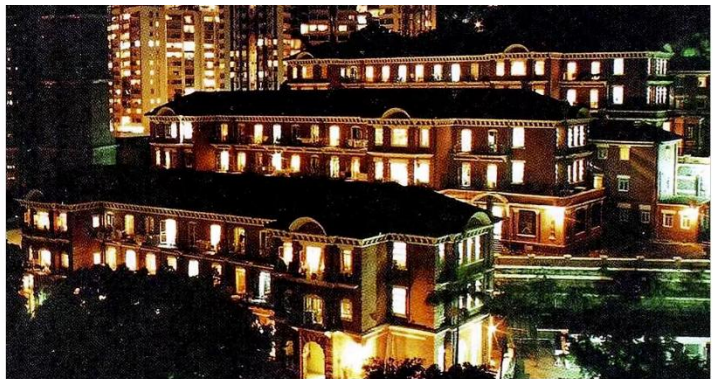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馮先生著作

筆者在 1963 年入學港大，同班的胡仲豪、周錫昌、曾振威、都住在盧迦堂。筆者沒有住宿，但每天都在盧迦堂吃午飯。回憶起來，有幾點是難忘的。第一、那是導學生進入社會高層的生活方式，學生添飯，只要舉起飯碗：“阿毓，裝飯！”就有白衣黑褲的校工侍候；宿生的房間，每天有校工進入打掃。第二、玩新生(Ragging)，新生對舊生(大仙)，稱呼對方：“Senior Gentleman Sir …”，稱自己：“Small I Green Horn …”。我的同學胡仲豪，一天頭髮半邊變成了平頭裝，稱為 Robert 裝；吃飯要用 Square Meal，每個動作都只能是直線與直角；因為要取得全部舊生的簽名，只能馴服。“升仙”以後，明年又“玩”新的新生。那是當年最深刻的印象。

宿舍生活，需要與時並進

1966 年 6 月，一場颶風暴雨，山泥傾瀉，捲走了最高的兩座(儀禮堂與梅堂)最近東面的舍監住所。1968 年重新裝修，把三所宿舍連接起來。1969 年 1 月 1 日，明原堂正式運作。馮以泓是第一任舍監。



■ 明原堂

筆者畢業後在外面教書、辦學，無緣親歷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。只記得有一次，被邀與司徒華同為高桌晚宴的嘉賓。飯後在舍監住所座談，我們坐在沙發，學生每人拿著一小杯咖啡，從容環立周圍，也是難忘的一景。

那時候，就已經聽說過馮以淦的改革。首先，日常用語從英語改為粵語（筆者念書時代頗多的馬來學生，已經絕跡）。其次，廢除表徵學生身份的短袖綠袍。再者，加入女生，設立男女同層（男女各半層，走廊在當中有活門隔開）。最震撼的，是取消“玩新生”；舊生覺得這是強化團結的傳統。博弈之下，終於去掉了類似“黑社會”的“升仙”儀式。

馮以淦的改革，其實遠遠超過這些可見的改變。從他的《憶明原》，可以看到他與時並進的意念與決心，但是又能夠看到他對年輕一代的信任和放心。筆者雖然沒有親歷他的領導，但是明原堂迅速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心。當年幾代的港大學生會會長，都住在明原堂 - 陸文強、馮紹波、陳毓祥（歿）、崔漪雲、麥海華。許多不是明原堂的學生，也會到明原堂“屈蛇”（非法寄住），方便活動。照馮以淦的說法：“七十年代。明原堂是學運的大本營。”“當時學運的領導和爭執中心在港大，而港大學運的重心則在明原堂。”

舍監責任，解除學生束縛

這是因為幾個社會的大因素。一、港大前任校長王賡武曾經說過，1969 年政府開始提供助學金，讓大批中下階層家庭的學生進入大學，改變了學生的社會成分。二、香港社會迅速轉型，也配合了西方國家社會意識的興起，香港也出現了第一批“公民社會”式的運動。三、中國的存在，逐漸進入香港人的意識。港大第一團（1971 年），首次搭起了香港與中國內地的溝通橋梁。也因此出現了學生當中“認中關社”的潮流。

從馮以淦的回憶看，他不是從事政治活動，也不是作為政治態度的裁判員。他只是解決了宿舍的功能問題，把宿舍一些不合時宜的，把學生束縛的元素解開，給予學生充分的空間，讓他們能夠與社會共呼吸，與時代一起前進。

從他的回憶，就可以看到，他在明原堂的十年，舍監與學生之間，學生與學生之間，也不是沒有矛盾與紛爭的。但是他基本上處之泰然，從容度過。就是因為，他覺得這些都是正常的，甚至是必然的。在宿舍裏發生的，只是學生成長的必然過程。他的許多改革，沒有一項是靠行政手段實施的。更多的是與學生交談商量；這過程不是行動的改變，而是學生有了思考，是他們有了一代宿生的改變。

1979 年馮以浹卸任以後，接任的是陳玉蘭（Margaret Chan），然後是劉永基（Winky Low）。筆者於 1987 年接任，直至 1992 年停止運作，堪稱“執笠”舍監。

最初接任，明原堂可以說是滿目蒼夷，舍監的住處，連同其他非住宿的地方，有些用大幅塑料布覆蓋，上面是蜘蛛網。但是受到宿生的歡迎，卻是難以忘懷的。接待我的是宿生會義務秘書，周妙玲（赴加拿大後與丈夫林一星回港），明知我沒有當過舍監，也沒有住過宿舍，非常細心地一步一步引導。逐漸融入了這個大家庭。

宿舍教育，開放自治空間

這時候，沒有了火烈的學生運動，但是仍然保持著鮮明的開放氛圍。當時我沒有看過馮以浹的回憶，但是感到學生強烈的年輕氣息。開始感覺到，學生有學生的價值觀與人生觀，不能簡單地、狹隘地用筆者自己的觀點去評判；他們提出的一些建議，我之前完全沒有想到。宿舍裏面一些傳統和規矩，沒有明文規定，卻言之有理、行之有效。這是一個成熟的群體！

明原堂孕育了一代人。一連串人們熟悉的名字——導師有陳載禮、陳坤燿、吳清輝、陸慧英、林建；畢業生有曾鈺成、陳婉瑩、羅啟銳、洪清田、曾繁光、…（恕此處只列馮以涇時期的學生），都是在明原堂渡過他們的大學年代。

對許多經歷過港大宿舍生活的人來說，大學畢業以後，記憶最深的也許不是聽過什麼課、做過什麼作業，而是宿舍生活的一幕幕。內地的大學，也開始有刻意建設宿舍社團的，打破了一貫以來純粹把宿舍看成是提供住宿，需要的只是管理。宿舍，是大學一個非常重要而難得的學習場所——不同學科、不同背景、不同信仰、不同國籍的，同在一個群體中生活——一生也許只有一次的學習經歷！

大學宿舍的教育，是一門學問。馮以涇在明原堂的十年，為這門學問塑造了一個框架，提出了許多關鍵的問題。核心的問題是：怎樣看大學生？

對筆者，明原堂的經歷，也是一種啓蒙：學生自治的智慧、活力和威力，為之後十八年筆者在兩所宿舍做舍監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也是筆者與宿生，結了許多忘年之交。也因為常年生活在年輕人之中，對年輕人有了欣賞與佩服——他們代表未來！